

蔡尚思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五册

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王船山思想体系

中国礼教思想史

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文化人立身治学经验

目 录

序言	9
一 文化事业的重大作用	
——评介《左传》、刘知幾、彭士望、李大钊等	11
二 博通专精,由博返约	
——评介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郑樵、马端临、 黄宗羲、顾炎武等.....	14
三 善疑好问	
——评介孔子、《易传》、《中庸》、朱熹、王船山、 戴震等	16
四 详近略远,厚今薄古	
——评介荀子、司马迁、王充、黄宗羲、万斯同、 全祖望、刘献廷、章学诚、王韬、梁启超等	18
五 善于分辨识、德、才、学四个条件主次地位	
——评介刘知幾、晁说之、李贽、屠隆、魏禧、王源、 叶燮、袁枚、王韬、朱一新等.....	27
六 长期、数世集体才著成一书	
——评介古来许多语言文字学家、博学家、朴学家、 历史学家、佛学家、医学家与集体写作	30
七 注重和得益于古迹名胜	

——评介司马迁、李白、柳宗元、澄观、徐霞客、 顾炎武、刘献廷、袁枚、魏源、谭嗣同、易顺鼎、 黄宾虹、顾颉刚等.....	33
八 重视师友、互相师友与尚友、私淑	
——评介孔颜、孔孟、申韩、商韩、马郑、智𫖮灌顶、 玄奘窥基、李杜、元白、韩柳、韩欧、三苏、苏黄、 程朱、陆王、颜李、李时珍与张元素、王船山与 张载、戴段二王、二叔、赵明诚与李清照(女)、 陆侃如与冯沅君(女)等和谭嗣同、樊锥的名言	37
九 在吃苦遭祸中立志奋斗	
——评介孔子、墨子、庄子、许行、王充、杜甫、韩愈、 柳宗元、张履祥、江永、戴震等和司马迁、王勃 的名言	41
十 终身同时间竞赛,分秒必争	
——评介孙思邈、欧阳修、文嘉、祝世禄、黄宗羲、 顾炎武、唐甄、胡明复、陈垣、俞振飞、华罗庚、 张舜徽等	46
十一 主持大图书馆和在图书馆做学问	
——评介司马迁、班固、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 陈垣、蔡元培、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柳诒 徵等	50
十二 分别对待图书与勤作笔记、先写长编	
——评介司马光、李焘与朱熹、顾炎武、钱大昕、 王念孙、俞正燮、陈澧、梁启超、陈垣、顾颉刚等	52
十三 注重寻觅要领,力求简明概括	
——评介朱熹、黄宗羲、王国维、陈垣等.....	54
十四 多读书多抄书多著书,反对剽窃抄袭	

	——评介顾炎武、王国维、陈垣等	56
十五	不仅不嫉妒,而且自认不如他人 ——评介陆机、杜甫、韩愈、顾炎武、戴震、王念孙、 焦循、胡适等.....	58
十六	跟着时代潮流前进 ——评介孙中山、鲁迅、李大钊、吴玉章和最后 大变的杨度等	61
十七	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出卖灵魂 ——评介文天祥、胡三省、傅山、黄宗羲、顾炎武、 李二曲、吕留良、方以智、李世熊、章太炎、 陈垣等	63
十八	坚持真理、反对旧传统而不惜多所牺牲 ——评介盖宽饶、桓谭、范缜、李贽、樊锥、李大钊、 吴虞和鲁迅、陈独秀、蔡元培等	65
十九	坚持信史实录而不畏权势压迫 ——评介刘知幾、吴兢和邵飘萍、恽逸群等	72
二十	破除命运、风水、鬼怪、天帝、先知等各种迷信 ——评介墨子、荀子、王充、范缜、吕坤、陈确、 熊伯龙、袁枚、《革天》等	83
二十一	打破君主个人迷信 ——评介许行、阮籍、鲍敬言、邓牧、黄宗羲、 唐甄、吕留良、曾静和孙中山等	89
二十二	写出字数少而代表性强的专著 ——评介《论语》、《老子》、《公孙龙子》、《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金刚经》、《史通》、《化书》、《明夷 待访录》、《本草从新》、《革命军》、《中国小说 史略》、《宋元戏曲史》、《清代学术概论》、《元西	

	域人华化考》等书及鲁迅、陈垣等论删繁就简、 言简意赅	91
二十三	在大量著作中自编文选和代编选集 以利于今人和后人 ——评介《鲁迅杂感选集》、《胡适文选》以及其他 许多文选、文摘	95
二十四	实事求是写自传 ——评介近几年来中国文化界的好现象之一	97
二十五	提倡“辞达而已矣”和做到“明白如话” ——评介孔子、墨子、司马迁、寒山、白居易、 韩愈、元曲、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	99
二十六	得力于自学而不求资格 ——评介李白、杜甫、郑樵、李时珍、黄宗羲、 顾炎武、颜元、章太炎、王国维等	102
二十七	长于办学与培养人才 ——评介孔子、墨子、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等	104
二十八	去外国长期留学而又多所译述 ——评介古代的法显、玄奘、义净与近现代的 容闳、严复等	105
二十九	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评介墨子、许行、黄宗羲、顾炎武、蔡元培等	107
三十	寄托于学术事业，把著书当作后裔 ——评介顾炎武、李塨、王韬、谭嗣同、樊锥等	108
三十一	百家争鸣与互相扬弃 ——评介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经过儒家长期 思想统治到清末民国第二次百家争鸣的 概况	111

三十二 为美育事业而坚决斗争	
——评介张玉良(女)	120
三十三 重视体育锻炼	
——评介《吕氏春秋》、华佗、吴普、曹丕、 孙思邈、李白、文天祥、颜元、秋瑾(女)、 蒋维乔、马寅初、关肃霜(女)等	126
三十四 促使思想武器的更新	
——评介严复、孙中山、朱执信和李大钊、 蔡和森等	128



序　　言

本书同《中国文化史要论》是姐妹书，是我的积稿之一。

这几年来，有些报刊和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了介绍学者治学经验的文章和专著，我也应邀写过一点文字。不少读者来函，要求我进一步解答这个问题。有人对我说：“无可否认，健在的学问家的治学经验，往往是从古代的学问家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国文化人总有一个基本相同的优良传统。以您平日的多读书，应当就古今学问家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成果、治学教训以及他们怎样做人等方面提出要点，并尽量指明其各自的特色，写成《优秀的中国文化人》或《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类专著，向青年学子介绍，也让其他各界都来学习。但不要光作介绍，介绍者也应当对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也是对学术文化界的一个贡献。后人也会同样地重视它，也会感谢您的简要评介的。”我面对这些要求，起先自愧水平不够，似难胜任，继则觉得有点“老马识途”，当是“责无旁贷”了。我想，既然自己几十年来经常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天地里往来，这许多文化人对于我来说多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多是我生平非常钦佩而一直在学习的好榜样，那么我就应当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尽可能地推荐其佼佼者作为人们立身治学的模范。这就是我写成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但我必须声明一下：这既不是全部中国文化

人的重要代表，也与“道统”代表人物根本相反，更不同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开列的三十二个人以及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种学问的十种书。

本书体裁，经我再三考虑，为了眉目比较清楚，最后决定打破常规，采用纪事体、类编体，按照问题来分，而不采用按照人物来分的纪传体和按照时间来分的编年体。

我最希望的是老前辈、平辈和其他读者都对我提出宝贵意见，并为本书增补重要资料，使之逐步臻于完善，终于成为一部能够反映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精华的集体著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于复旦大学

一 文化事业的重大作用

——评介《左传》、刘知幾、彭士望、李大钊等

一提及文化事业，首先就会想到书。《易·系辞》、《书·序》等都说上古从“结绳而治”到“易之以书契”。《老子》却反而要从有文化倒退到“结绳而治”的状态。上古没有文字，人们以结绳纪事，大事大结，小事小结。《释文》解释“书契”为“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其实，这在上古是不可能的。殷墟才有契文，即用契刀刻的甲骨文字。据顾炎武考证：“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石刻曰同书文字。”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论及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左传》对道德、功业、文献“三不朽”作了比较，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是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同是不朽，但“立言”不如“立德”、“立功”重要。它虽然把“立言”置于“立德”和“立功”之下，但是第一次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肯定了下来。

清初彭士望则大论立言或著书的更加重要。他说：

世称“三不朽”者“立言”其一，而“德”与“功”则非“言”无由传，盖言者心声，而书，言之府也。是故蕴古今之宏深，发

天地之秘奥，溯圣贤之渊微，以逮万事万物之治乱、是非、得失、倚伏、消长、新故、损益、绝续、散殊、会通、出入、从违之故，皆取之于书。书之为物，极而推之，山海不足以喻其富，鬼神不足以擅其奇，日星河岳不足以方其高明而广大，视龙蝘蜓，视蠡车轮，不足以方其神化而凝一，此吾儒之所以斯须不能去，与宇宙相为开辟、消闭、先后天而弗违者也。乃老聃则以为太漫，庄生则以之为糟粕，释氏则尽欲空之，谓语言文字可以不立，顾其徒之书诞漫卮衍，不可穷诘。老庄亦尝自著书，其徒效之，书且与释氏埒，俱自相舛背，是遵何说？（《树庐文钞·传是楼藏书记》）

最反对语言文字的如老庄、佛教，尤其是佛教禅宗，却也同样需要语言文学。六祖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和尚，但其信徒认为需要有一本《六祖坛经》。不仅需要有此书，而且尊称它为“经”。不仅此书为“经”，凡收入《大藏经》中者都无一不是“经”。而佛教《大藏经》数量之多，竟超过任何一家。不仅道、佛二家如此，而且主张和实行焚书的法家商鞅、韩非、李斯之流，也都需要著书立说，并欲布之天下，传之后世。于此可见，凡是否定著书立说者，结果都被著书立说所否定；凡是企图毁灭文化者，结果都被文化所毁灭。

彭士望是就著书立说的关系重大来立论的。刘知幾则云：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

这是从历史记载的重大作用来立论的。

刘向把书比做药：“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愈愚。”药能治好病，书能治好愚。

近人李大钊也把知识比做灯烛，认为：“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

总之，只要是辞别了蒙昧时代的人类，只要是比较文明的国家社会，都是缺少不了用文字记载语言、思想、行动、事物的图书的。

二 博通专精，由博返约

——评介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郑樵、
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等

我在《中国文化史要论》一书中，既论述了专精与博通的辩证关系，又举出数十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博学多能者为例用以说明问题。对此，这里就不重复了。

做学问专精不易，博通更难；而博通之中又是博不易，通更难；述古不易，创新更难。古来如庄子、荀子、司马迁、刘向、郑樵、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等，可以算得是比较博通的，郑玄、朱熹、钱大昕等博而不一定很通，高邮王氏父子等则精而不一定很博。

汪中是清代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儿子喜孙（即喜荀）指出乾隆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道：“今之经学书，无过《通艺录》（程瑶田著）、《经义述闻》二种。《通艺录》既精且博，千门万户，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成，亦非读数十年之功不能读。《经义述闻》实事求是，不尚墨守，非读书数万卷不能览，亦非读书数万卷不能注……善学者，贵乎述，尤贵乎作。当今经学昌明，贯通众家之说固难，作述一家之言尤难，博览群籍固难，独辟门径尤难。”（《从政录·再示左生书》）这是比较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的。曾国藩特别强调精读的重要性：“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子厚自述其所得……”

皆不甚多……高邮王氏父子,怀祖(念孙)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凡十六种,又别著《广雅疏证》一种;伯申(引之)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凡十二种。王氏父子之专,古今所罕,然亦不满三十种也。”(《曾文正公家书》)尽管上述汪曾两种说法有些不一致,但也说明博通与专精总是无法分开的。高邮王氏父子著作中考订之书虽“不满三十种”,但如果认为只要读过三十种书就能成为专精者而写出那些名著,这是必无之事。阮元指出:“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叢诸古子史,哲嗣伯申……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人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经义述闻序》)可见古人所说的“由博返约”是正确的。

汪喜孙强调专家难于通人,略如上述;蔡元培却反而强调通人难于专家,认为“夏曾佑的学识通博过于章太炎,章太炎只是学人,学人难,惟通人更难。学人惟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从上述看来,较全面地说应当是:

- (一) 要博古通今;
- (二) 通人难于专家;
- (三) 新作难于述旧。

三 善 疑 好 问

——评介孔子、《易传》、《中庸》、
朱熹、王船山、戴震等

光好学读书是不够的，还要善疑好问。孔子从少入太庙“每事问”，他主张“疑思问”，称赞孔文子（卫国大夫，名圉）的“不耻下问”，即勤学好问，不因自己的地位高而以下问为耻。荀子把“不知则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易传》也说：“学以聚之，问以辨之。”王充更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行，不问不知。”（《论衡·实知篇》）

王船山论学与问的重要性说：

问，次于学者也；问之道，尤重于学也。三代以下，于学也博，于问也寡；三代以上，于学也略，于问也详；故称舜之大知，好问其至矣。虽然，学者，自为学也；问待人，而其涂有二：有自问者，有问人者……不问而不我告，问而犹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为大知也，圣之津梁也。（《读通鉴论》卷十四）

“学问”是“学”和“问”联在一起的，不学不问怎样能成为学问家呢？《中庸》把“审问”和“博学”、“慎思”、“明辨”、“笃行”作为学问的五个条件。程子说：“五者废其一，非学也。”